

# 盛治：一幅新發現的乾隆時期“澳門山水長卷”探析

楊斌

**[摘要]** 發現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前博物館的清代澳門山水長卷（30 x 318 厘米）未曾收錄於有關澳門地圖或繪畫的任何著錄中。在結合同時代的文獻，對其主題、內容和特點尤其是圖中呈現的清代澳門關部行台和稅館等加以比較分析，可知此長卷是一初受西洋畫法影響的中國畫家所作的傳統山水長卷，時間約為乾隆早期或中期（十八世紀中期），是目前發現的最大的一幅澳門地志畫，是中國視野下以澳門為主題的一幅最早最大的中國傳統山水畫。與目前發現的所有中外繪製的澳門地圖和繪畫相比，此卷氣勢雄偉，特點鮮明，其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值得澳門學界格外注意。

**[關鍵詞]** 澳門關部行台 稅口 澳門地志畫 澳門山水長卷 中國視野 真蒂洛尼家族珍藏繪畫

## 一、藏於新加坡

2017 年春，筆者在國立新加坡大學（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李光前博物館（The Lee Kong Chian Collection）偶然瞥到了正在展覽的一幅“澳門山水長卷”（圖 1），大致描繪澳門地形。全畫長達三米，建築高大雄偉，櫛比鱗次；山水浩渺，人物繁多；漁船或三三兩兩，或密密麻麻；用色鮮明，引人注目。經過申請，筆者於 2017 年 7 月 6 日特地查看了此長卷，並拍照留存。<sup>①</sup>

瀏覽“澳門山水長卷”，我們可以發現它與乾隆初年編撰的《澳門記略》之相關記錄十分契合，暗合中國古代左圖右史的傳統，可以互相映證。筆者根據有確切紀年的《澳門記略》（包括文字和附圖），結合其他清代文獻如《（乾隆）香山縣志》，曾對澳門山水長卷略加介紹和分析，<sup>②</sup>此處不再贅述。

“澳門山水長卷”圖是澳門歷史和文化的一個重大發現，值得澳門學界和社會進一步關注。本文在簡述長卷的發現和主要內容外，根據最近的研究，著重討論圖中不大引人注目、但在澳門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澳門關部行台及其下轄稅館，並借此指出，這是一幅中國視野下的、以澳門為主題的中國傳統山水畫，歷史和文化價值尤為突出。

**作者簡介：**楊斌，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sup>①</sup>特此感謝博物館的工作人員 Wardah Mohamad, Donald Eric Lim 和 Nuranini Othman 的幫助。

<sup>②</sup>楊斌：《百里江山圖——新發現的一幅新加坡藏澳門山水長卷初探》，《文化雜誌》（澳門）2021 年總第 113 期，第 6—25 頁。

圖1 “澳門山水長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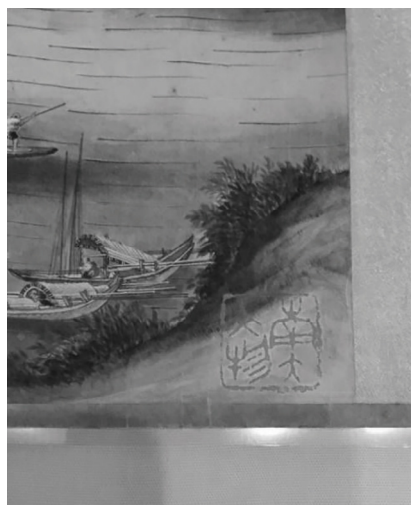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前博物館。

此長卷目前藏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前博物館內，但其最初來源是當年新加坡的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 1955—1980）之藏品。因為長卷的右下角鈐有“南大文物”一印（圖2），“南大”為南洋大學之簡稱，所以此長卷當年屬於南洋大學。

以筆者所知，此長卷不曾見於其他任何著錄。研究明清時期澳門城市建築最全面細緻的邢榮發博士以及對澳門地志圖有過深入研究的莫小也教授均未提及此圖，<sup>①</sup>澳門科技大學收錄的澳門古代地圖亦不知此圖。以下對其描繪的景觀略加介紹。

圖2 “南大文物”鈐印



圖片來源：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前博物館。

<sup>①</sup>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第161—163頁；莫小也：《地誌畫與澳門地誌畫研究述要》，《文化雜誌》（澳門）2003年總第49期，第145—170頁；莫小也：《地誌畫：記憶中的澳門風景》，《文化雜誌》（澳門）2004年第53期，第37—54頁；莫小也：《澳門美術史》，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年，第51—66、96—100頁；[英]詹姆士·奧朗奇（James Orange）編著：《中國通商圖：17—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何高濟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

## 二、氣勢宏大的澳門山水圖

“澳門山水長卷”一眼就引人矚目，因為它尺幅巨大，氣勢雄偉。此畫長為 318 厘米，寬為 30 厘米（約為一尺），已經無法在一般空間內全部展開欣賞。但長卷原來更長，因為後來裝裱，左右均有裁剪。此畫右側，也就是長卷起首處，三條漁船被截成半段，顯然是裝裱的原因。當然，從主題看，首尾裁剪的尺幅有限；裝裱裁剪者一般也不可能割捨全畫的重要部分。因此，筆者估計，原畫的長度約在 330—340 厘米左右。

“澳門山水長卷”同樣引人注意的特點是顏色鮮豔，令人賞心悅目。長卷運用了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模式、技巧以及顏色，也模仿了一些西洋畫的技巧，其藝術特色也值得我們關注。筆者不懂藝術，故專門請教了同事朱天舒教授，承蒙她花時間研究此畫並與筆者分享。總體說來，澳門山水長卷依託中國傳統山水畫的形式和構圖，但在筆法、用色、光影、透視等方面運用了西方畫法。雖然技法水平不是非常高，但畫作宏大，尤其視覺效果強烈，在當年應為一新奇的作品。雖然此卷大量應用西洋畫法，但是它完全符合中國傳統的平遠山水構圖、又依託紙本設色手卷的中國畫的形式。

此畫的內容尤其值得澳門學界注意。長卷從右往左依次展開，大致是採用從澳門半島南面向北從海面平眺澳門半島的形勢。雖然過去有關澳門的地圖和繪畫也曾採用了這種方式，但沒有一幅如此宏大，特別是此前沒有一幅中國傳統的水墨畫來展示 18 世紀澳門的風光。

全圖以澳門半島為中心，從東往西往北，東側起首大致是澳門通廣州的航路，依次繪有炮台、大三巴、炮台、青洲、望廈村、關閘、白石、前山等地，西側結尾則為內港，遠處可見標識三字“香山城”。“澳門山水長卷”雖然是中國畫，但並無題跋，圖中雖然包括了澳門許多重要的機構和地理標識，但標識中文地名的只有幾個，而且都集中在手卷左側，也就是內港附近。自大三巴寺往右，從右到左（實際方位大致從南往北從東往西）依次為“青洲”、“望廈”、“關閘總汛”、“白石”、“前山”、“亞媽角汛地”、“磨刀汛地”、“石岐頭”、“香山城”。這些地名均位於清代香山境內，基本為大家熟知。不過，其中的“亞媽角汛地”需要作一解釋。

亞媽角即娘媽角，這個亞媽角不是澳門的亞媽角，過去有學者將兩者混為一談。這個娘媽角與澳門的同名異地，位於澳門以北，又名南野角，在前山西二十餘里，與秋風角對峙。《澳門記略》記載，澳門“又北為秋風角，為娘媽角。一山嵒然，斜插於海，磨刀犄其西，北接蛇埗，南直澳門，險要稱最。”<sup>①</sup>據此，磨刀汛地就在磨刀門。大磨刀與小磨刀是位於今中山與斗門交界處的、磨刀門水道處的兩個島嶼（圖 3）。

<sup>①</sup>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第 39 頁。

和西方的地志畫或者 19 世紀的外銷畫不同，“澳門山水長卷”非常突出地體現了中國畫傳統——山水畫的特色。長卷遠近繪有許多建築物，如近處不厭其詳的大三巴，以及遠處隱隱約約的前山寨和香山城。這些建築物前後左右為山水環繞，尤其水道蜿蜒，漁船或簇擁或星散，山水的地理特徵非常突出。雖然澳門附近的水是海水，水道是海灣，但這一特點完全符合中國傳統的山水圖，尤其是尺幅較大的“江山”圖。有意思的是，如果單看水道水灣，我們完全看不出長卷繪製的是海水和海灣，它們呈現的場景完全是中國傳統的河流和河道。《澳門記略》說前山“北距香山縣一百二十里而遙，南至澳門十有五里而近”；<sup>①</sup>《（乾隆）香山縣志》則說“濠鏡澳山在城東南一百二十里”，<sup>②</sup>則澳門距香山城大致一二三十里，故此長卷可以視為關於澳門的一幅百里江山圖。這是一幅氣勢宏大的澳門山水圖。

圖 3 亞媽角汛地與磨刀汛地



圖片來源：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前博物館。

### 三、澳門關部行台

“澳門山水長卷”原雖不大引人注目，其佚名繪製者也未濃墨重彩，但在今天我們看來卻非常重要，因為它繪有在顯榮里發現的清代澳門關部行台舊址。

關於關部行台，《澳門記略》記載：“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唯議事亭不廢。國朝設有海關監督行台及稅館。”<sup>③</sup>對於清代澳門關部行台建築的變遷，邢榮發有過相對詳細的研究、考證和重構。<sup>④</sup>他比較了 1731 年雍正時期《廣東通志》中的“澳門圖”和 1751 年《澳門記略》的“關部行台圖”，指出，《澳門記略》中“側面澳門圖”基本參照《廣東通志》中的“澳門圖”；而且《廣東通志》中的“澳門圖”“立體且清晰展示了當時建於北灣的關部行台建築群”，比《澳門記略》中的“關部行台圖”更“清楚顯示出建築物的形體、部分建築材料及屋頂的類型”。<sup>⑤</sup>分析兩圖，邢榮發辨識出，1751 年的關部行台建築群，比起 1731 年，增建了“左右轅門及照壁與圍牆之間的木柵欄”以及大門西北面守值官的小屋等。總體而言，關部行台包括下面幾個部分，邢榮發的描述如下：

<sup>①</sup>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第 22 頁。

<sup>②</sup> [清] 暴煜修：《（乾隆）香山縣志》卷之一“山川”，乾隆十五年（1750），第 14 頁。

<sup>③</sup>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第 24 頁。

<sup>④</sup> 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年，第 161—163 頁。

<sup>⑤</sup> 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年，第 161 頁。

第一，照壁，石頭牆基，牆壁上有圓形洞，或為窗戶。第二，木柵欄和轅門。柵欄東至圍牆，西至守值官小屋外牆，東西各開一道轅門，形成一個封閉的院落。轅門也是木制，上掛匾額，頂上覆蓋瓦片。第三，旗桿。兩根旗桿各立於兩塊方石之中。方石正中應當打孔，可以插入旗桿。旗桿立於大門兩側，旗幟上各有“關”、“部”二字。其他地圖中有的旗幟字跡不清，可以以此參照，旗桿後各有小屋，當為土地祠（福德祠）和其它神祠（如關公）。第三，大門。大門也是木制，位於圍牆正面中軸線上，大門兩側木質門柱又與圍牆相連，離相連處不遠有方形牆柱，柱頂為雙坡瓦片。第四，大堂。大堂為三間七架二柱單層結構，屋頂為琉璃瓦面，屋脊有裝飾，山牆開小窗洞，堂前有廊，廊端有拱形門洞。比較特殊的涉及是屋頂還延伸出拱形屋簷，按比例當有二三尺，這樣的屋簷設計在中國古代建築甚為少見，或是為防避澳門的大風大雨考慮？第五，吏房。大堂前之東西房當為吏房，相當狹窄，瓦頂為卷棚，牆腳及牆腰捆以壓磚，各有小窗。第六，後堂。後堂是最核心的建築，為兩層木結構建築。第一層五間，瓦簷；第二層以回形走廊環繞，回廊以木柵桿包圍，設有木制門窗；屋頂為歇山式；內院有東西廂房。另外與後堂平排左右各有小屋，應為廚房及倉庫，各設宅門。<sup>①</sup>

以上便是雍正至乾隆年間的關部行台建築，可以參見邢榮發所考繪的平面圖（圖4）。

圖4 澳門關部行台平面圖



【圖5-15】關部行台平面佈局圖(邢榮發考繪)

圖片來源：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第163頁。

關於關部行台的位置，邢榮發指出，照壁位於今天的關前正街，整體建築坐東北而朝西南，大致與傳統建築相符；照壁與大關圍牆之間架起木柵欄，東西各開一轅門；關前後街即為穿越轅門的古道，關前正街應為後期填成。<sup>②</sup>

到了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關部行台周圍已經密密麻麻建有房屋，這與“澳門山水長卷”所見的關部行台一帶（圖5）大不一樣，由此也可判定長卷繪製當在雍乾年間，不會晚於乾隆晚年。

<sup>①</sup> 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第161—162頁。

<sup>②</sup> 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第162—163頁。



圖5左側中部有一簇並不起眼的建築，位於山腳濱海處，也就是內港一側。這處的矮小建築物最引人矚目的，是前方靠內港處有兩根高高矗立的旗桿，旗桿立於方石之上，頂部略往下懸掛三角旗。假如從內港登陸澳門半島，穿過旗桿往前，左側便是一座大堂，穿過大堂，便是一叢帶有圍牆的建築物，便是後堂。後堂右側的廂房也清晰可見。因此，筆者推測，這帶有兩根旗桿的建築物群，雖然沒有中文標識，便是清代的澳門海關。

參考《澳門記略》中幾幅澳門地圖便大致可知。“正面澳門圖”繪有澳門的關部行台，並標識“關部行台”，其所處位置正是依山傍海。此處建築群因房屋和圍牆形成封閉區，而且門前聳立兩根旗桿。《澳門記略》所有附圖中，立有旗桿的還有東望洋炮台、西望洋炮台、南環炮台、娘媽角炮台、大碼頭以及兩個稅口，但這些地方的旗桿只有一根；唯關部行台繪有兩根旗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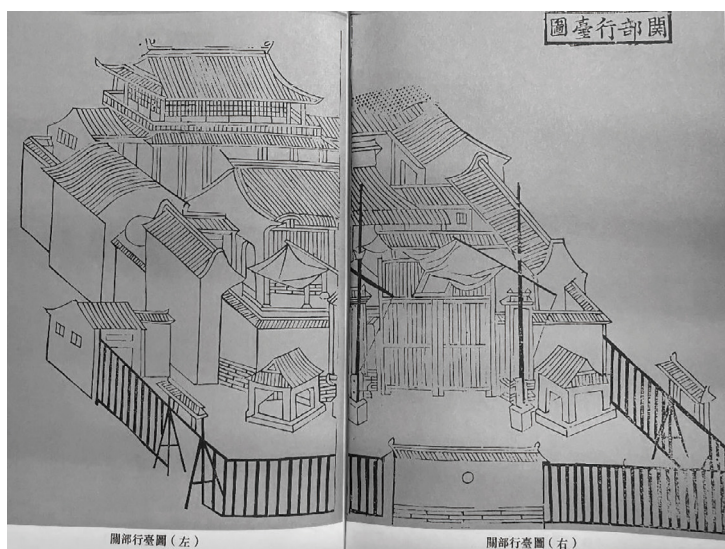
(圖6)。<sup>①</sup>此外，《澳門記略》所附“青洲山圖”中也有“關部行台”，亦樹立兩根旗桿，旗幟上“關”字大致可以辨析。這一特徵，加上依山傍海的地形以及封閉院落的情形，清楚地說明了“澳門山水長卷”中立有兩根旗桿的便是澳門關部行台。

圖5 “澳門山水長卷”所見之“關部行台”



圖片來源：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前博物館。

圖6 《澳門記略》“關部行台”



圖片來源：[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214—215頁。

<sup>①</sup>[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214—215頁；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485—502頁。

早於《澳門記略》二十年的《（雍正）廣東通志》也附有澳門圖（圖7），亦可作為參照。<sup>①</sup>同樣，關部行台濱海而立，門口立有兩根旗桿，旗桿上飄着兩面旗幟，分別繪有“關”、“部”二字，清晰可見。關部行台右側有廚房和倉庫，標有“十八間”字樣。其標誌旗桿以及方位與“澳門山水長卷”彷彿。

圖7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局部）



圖片來源：《（雍正）廣東通志》卷三“澳門圖”，第45頁。

總之，澳門關部行台的標誌物是兩根旗桿，這無論在地圖還是地志畫中都不會缺席，如1838年的《粵海關志》的“澳門總口圖”和鴉片戰爭時英軍在關天培書房內繳獲之《前山——澳門防禦圖》。<sup>②</sup>

關於關部行台，最契合“澳門山水長卷”者，莫過於是繪製於18世紀下半期的Gentiloni Painting（真蒂洛尼家族珍藏繪畫），目前藏於香港海事博物館。<sup>③</sup>Gentiloni Painting為紙本設色水粉，亦相當宏偉，實際尺寸為83.5 x 170.5厘米，原本為Camillo de Rossi（外交官和收藏家）的後代擁有；Camillo de Rossi大概在1807或1809年購買於里約熱內盧，則原畫可能是澳門本地的葡人官員或教士輾轉到巴西任職而帶去。香港海事博物館在說明中指出，由此圖中的St. Joseph's Convert（聖若瑟修院）的牆可知，大約繪於1760年後；而其他因素則指向1760年前。無論如何，這幅畫的年代和“澳門山水長卷”大致相當。

<sup>①</sup> [清]魯曾烜編纂：《（雍正）廣東通志》卷三“澳門圖”，第45頁，見《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有關此圖，湯開建曾有介紹。見湯開建：《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研究》，《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州）2000年第6期，第54—60頁。

<sup>②</sup> 以上兩圖以及解讀，見金國平教授2021年5月26日在澳門大學歷史系的講座“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清代澳門歷史（1685—1849）暨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之概念”。

<sup>③</sup>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gentiloni-painting-macao-late-18th-century/sgGqEzgtbWYQSA>。

Gentiloni Painting 雖然採取了俯視的角度，但其主要畫面與“澳門山水長卷”大部分重合。它也是以澳門半島南端開始，畫面上部為澳門半島東部海域，也就是澳門通廣州水道，畫面中間為澳門半島，畫面下部為船隻繁密的內港。因此，它和“澳門山水長卷”的前半部分是一樣的。唯此畫收尾於關閘，“澳門山水長卷”後半部分如白石村、石歧、前山寨直至香山城均不見於 Gentiloni Painting。因此，相較於“澳門山水長卷”，Gentiloni Painting 完全關注於澳門城區。

Gentiloni Painting 此畫左側以關閘收尾，關閘右側依山傍海便是澳門關部行台（圖8）。其地理位置、建築物形狀以及兩個旗桿與“澳門山水長卷”幾乎如出一轍。從所處位置看，兩圖中的關部行台都距關閘不遠，面對青洲，依山傍海，而且背後的山是小山，從而可以推斷關部行台建立在山坡之上；從建築物的特徵看，門前都有高聳的兩根旗桿，上面懸掛旗幟；從建築物的本身形貌看，關部行台的樓宇比較矮小，和大三巴的教堂比相形見绌，同時與其他的建築相對隔開。Gentiloni Painting 中的關部行台是典型的中國建築，彷彿中國的城樓；“澳門山水長卷”則更寫實，畫的是不規則的帶圍牆的建築群。不管怎樣，這兩幅圖都將18世紀中後期的澳門海關寫入圖中，相互映證了這個代表着清政府對澳門管轄權的重要機構的存在。同時，兩相對照，我們也可以大致推定“澳門山水長卷”的製作年代和 Gentiloni Painting 相當，約在18世紀中期。

### 圖8 Gentiloni Painting 所見 之關部行台



圖片來源：<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gentiloni-painting-macao-late-18th-century/SgGqEzgTbWYQSA>，香港海事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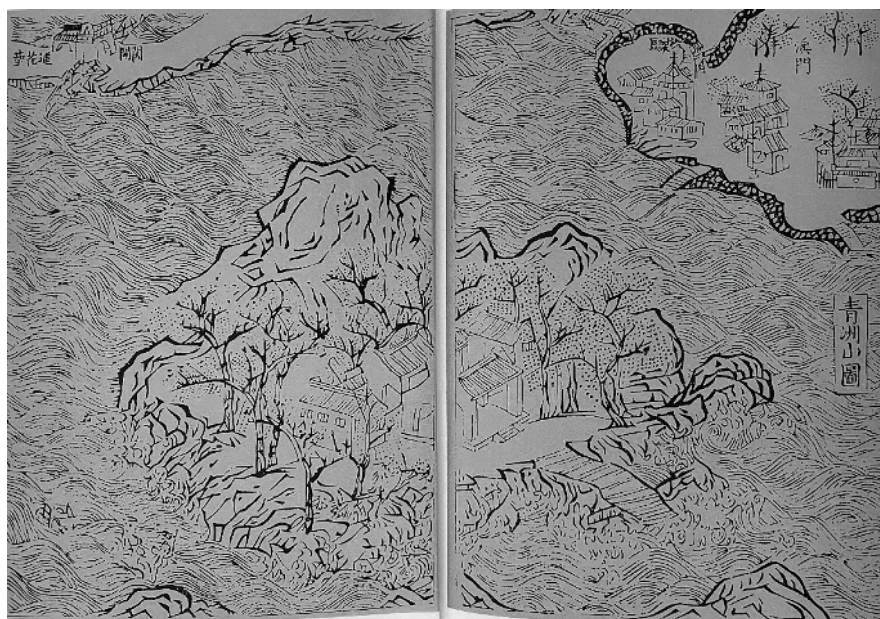
又，由於兩圖中的青洲頗為相似，不妨略加討論。《澳門記略》記載“北則青洲山，前山、澳山盈盈隔一海，茲山浸其中。厥壤砢，厥木樛，巘岈蒼蔚，石氣凝青，與波光相上下，境殊幽勝……今西洋蕃僧構樓榭，雜植卉果，為澳夷遊眺地”。<sup>①</sup>這兩圖證實此言不虛。“澳門山水長卷”和 Gentiloni Painting 都表明，青洲獨立海中，島上建有西洋建築，即所謂西洋蕃僧所構之樓榭，兩圖中青洲島上建築的地理方位也一致。特別有意思的是，“澳門山水長卷”還在西洋建築的門口畫了一個夷人正在敲門或進門，或許是前來遊眺之人。再將兩圖與《澳門記略》的“青洲山圖”（圖9）比較，<sup>②</sup>三者大致相同。

<sup>①</sup>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38頁。

<sup>②</sup>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206—20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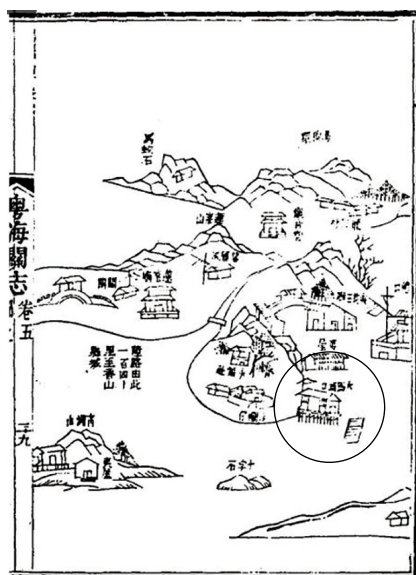
圖9 《澳門記略》“青洲山圖”



圖片來源：[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206—207頁。

#### 四、稅口

圖10 《粵海關志》“大馬頭口”



圖片來源：[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五，北京大學圖書館影印本，第29頁。

澳門海關行台其下分設四個海關稅口：“大馬頭口、南灣口、關閘口、娘媽閣口。”<sup>①</sup>“澳門山水長卷”由於完全忽略了媽閣廟這一塊，因此沒有繪製娘媽閣口，而關閘一處如前述，也無海關稅口之標識。不過，大碼頭口和南灣口則在長卷中可以發現。“大馬頭口”在《粵海關志》附圖（圖10）可見。<sup>②</sup>

<sup>①</sup> [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五，北京大學圖書館影印本，第28頁。

<sup>②</sup> [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五，北京大學圖書館影印本，第29頁。

大碼頭便在三巴寺之前不遠。如“澳門山水長卷”中所見（圖 11），三巴寺不遠便是舶口（碼頭），船舶林立。第二任澳門同知張汝霖在李廷富、簡亞二被害案之後，提出十二條善後事宜，其中第二條為“稽察船艇。一切在澳快艇、果艇，及各項蛋戶、罟船，通行確查造冊，發縣編烙，取各連環保結，交保長管束，許在稅廠前大馬頭灣泊，不許私泊他處”。<sup>①</sup>所以舶口此處船隻甚多，為澳門海洋貿易最繁華之處。圖 11 可見，在碼頭和三巴寺圍牆外，有一簇中國傳統建築物，包括封閉院落的主建築和院落外一處木制亭子；透過圍牆主建築依稀露出大堂，仿佛一處官署；木亭子三面並無柵欄，唯對着海灣的一面有白色牆面，前面中間為一紅白兩半組成的太極圖；亭子立有兩根旗桿，上飄着兩面旗幟。此外，在濱海的碼頭處，還有一處帶着天棚的房屋，那也是稅館的一部分。這兩處組成了澳門關部行台下的的大碼頭稅館，不妨對照《澳門記略》相關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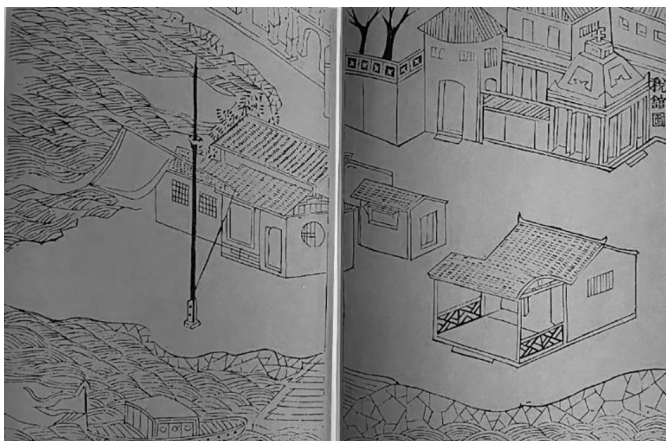
圖 11 “澳門山水長卷”所見之“大碼頭稅館”



圖片來源：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前博物館。

《澳門記略》附有“稅館圖”（圖 12），坐落於三巴寺外，瀕臨港灣。其中圖左部分為稅館主要駐所，帶有封閉院落，門前樹有一根旗桿，飄懸旗幟；面對港口的房子一側開有圓窗，遠看仿佛太極圖；右部分有一處帶着亭子的小屋。“澳門山水長卷”似將圓窗畫作太極，並移花接木繪於亭子面海一側。又，澳門關部行台的照壁開有圓形窗，則大碼頭稅館或者照搬此類建築。

圖 12 《澳門記略》“稅館圖”



圖片來源：[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216—217頁。

<sup>①</sup>[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93頁。



邢榮發根據“稅館圖”解釋說，稅館應該就是圖中左右樹立旗桿的房子，旁邊帶有月台頂棚者應為大碼頭官廳；作為主要碼頭的大碼頭的稅館建築簡單，只是硬山單體建築，則南灣稅口和媽閣廟稅口應該相似，甚至更為簡單。<sup>①</sup>他的推斷是很有道理的，“澳門山水長卷”中所見的南灣稅口可以參證。

南灣也可以在“澳門山水長卷”發現。在三巴炮台之下，有一中國傳統的建築和旁邊的西洋建築相比越發顯得矮小逼仄；即使和大碼頭稅館比較，也相對簡單。稅口旁邊立有旗桿，懸掛大旗；旗桿右側便是大石築成的海堤，堤外有船隻停泊往來。根據方位和建築特點，這應該就是南灣稅口（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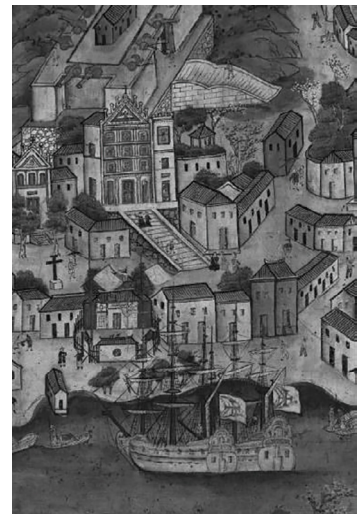
關於大碼頭稅館，Gentiloni Painting 亦可參證（圖 14）。Gentiloni Painting 圖中的三巴寺牆外也是一個小房子，立有兩根旗桿；小房子有柵欄圍成一個封閉的院落；院子左側大門門口還有兩個頭戴紅纓官帽身着短衣馬褂的清軍守衛；小房子面對港灣的一面白牆上繪着赭紅色的圓圈中間有一縷白色。我們雖然無法辨識這個圓圈究竟是甚麼，但參考“澳門山水長卷”，這個圓圈應該是太極圖。而 Gentiloni Painting 的白色小房子，便是“澳門山水長卷”中的木制柵欄。無論如何，三者的相似處一目了然的。因此，澳門山水長卷和 Gentiloni Painting 都屬於 18 世紀澳門的地志畫。

圖 13 “澳門山水長卷”所見之  
“南灣稅口”



圖片來源：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前博物館。

圖 14 Gentiloni Painting 的三巴寺、  
三巴炮台和稅館



圖片來源：香港海事博物館。

<sup>①</sup>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年，第 165 頁。

## 五、盛治

總而言之，“澳門山水長卷”描繪了澳門的山水風景和民居，是以澳門生活和景觀為中心的中國傳統山水畫。粗略統計，“澳門山水長卷”共繪有人物約 173 人之多，特別是澳門城區內部，完全符合《澳門記略》所說“其商僧、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賃夷屋以居，煙火簇簇成聚落”。<sup>①</sup>其中可辨析的蕃人約 38 人，漁民約 70 人；漁船約有 121 艘。漁民和漁船之多，中國歷代畫中屈指可數。可惜的是，長卷中全部都是中國的船隻。因此，讀者大致可以判斷，這是一幅真正以澳門半島為主題為中心的澳門風光圖。

那麼“澳門山水長卷”作於何時呢？令人比較遺憾的是，“澳門山水長卷”雖然是中國山水畫，但並無題跋，因此，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作判定。不過，長卷中的大三巴未曾遭到火災，則此畫當作於 1838 年前。長卷即和乾隆初年的文獻《澳門記略》相符，又與大約作於 1760 年後 Gentiloni Painting 基本一致，綜合各方面因素，筆者曾認為此畫作於乾隆中後期，也就是 18 世紀中後期。不過，考慮到長卷中澳門關部行台孤零零獨立一處，周圍並無房屋建築，這和 18 世紀末期關部行台周圍民房茂密的情況不符，筆者現在更傾向於認為“澳門山水長卷”繪製於乾隆早期或中期，也即 18 世紀中期，時代與 Gentiloni Painting 相同或略早。

此外，“澳門山水長卷”的主題是甚麼呢？繪製者的目的何在？筆者認為，“澳門山水長卷”和外銷畫不同，突出的是中國視野、中國風格、中國特色，其主題可以說是“盛治”下中外交錯樂業安居的澳門。

“澳門山水長卷”當然是一幅澳門的山水圖，和 18—19 世紀清代官方的海防圖或航海圖比較而言，澳門山水長卷屬於“畫”，而不是“（地）圖”，藝術氣息極其突出，並沒有實用功能，當然也談不上甚麼軍事和航海的性質。這一點，無需對照清代的航海圖或海防圖，一眼可知。

其次，在“澳門山水長卷”中，澳門當時存在的一些軍事設施也被淡化。中外文獻和圖畫中必然強調的葡人建立的各個炮台以及大炮基本被簡化甚至抹殺，圖中雖然在相應的炮台位置上繪有建築物，標有旗桿，但是，這些建築物和教堂幾乎一樣，看不出其軍事防備的特徵。特別是“澳門山水長卷”雖然繪有三座炮台，每座炮台都有一根旗桿，旗幟高懸，葡人的標誌“十字”隱約可見；可是，單純從建築物看，很難判斷這是一個炮台還是教堂，抑或是居民區。因此，澳門的軍事性質也就相應淡化乃至於消失不見了。在這樣的場景下，葡人軍事駐紮和佔領這一特點幾乎無法從圖中看出，特別是聯想到長卷中一百多艘船全部都是中國的船。近人心目中“堅船利炮”這一西方列強的象徵完全沒有在“澳門山水長卷”中得以反映。與之相反的是，18 世紀前後西方關於澳門的油畫或地圖乃至外銷畫，要麼突

<sup>①</sup>[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第 24 頁。



出其軍事和海洋航行的性質，要麼突出中國風。在澳門半島的地志圖上，城堡和炮台以及教堂往往是顯而易見的標誌物；在港口圖中，洋船則撲面而來，其殖民、通商和軍事意味一眼便知。

另一方面，“澳門山水長卷”根本沒有諱言葡人在澳門的居住和生活。三巴寺的雄偉以及附近一帶的繁華，葡人的衣着和活動，長卷都濃墨重彩，毫無避諱質疑。<sup>①</sup>長卷繪製了幾個突出的場景，一個當然是起首處依山而立巍峨壯觀的大三巴，期間葡人絡繹；一個是收尾處的石岐頭至香山的港灣，船隻林立，桅桿高聳，中國傳統的建築物依山傍海，鱗次櫛比。靠海的便是商鋪，依山的多為民居。關閘總汛恰恰居於圖中，一道圍牆將蓮莖隔開，唯有城門可以出入，關閘與前山寨之間又是巍峨的高山，兩側又是水路。這樣中外華洋便被自然和人工設定的疆界一分為二。以此看來，“澳門山水長卷”反映了澳門首任同知印光任所指出的“民夷交錯”的澳門景象，<sup>②</sup>突出的主題便是中外相隔華洋相處的和睦與繁華了，正如張汝霖詩中所說：“海隅容錯處，應視一家猶。”<sup>③</sup>1739年任廣東按察使司的潘思渠（1695—1752）在奏摺中稱：“我朝懷柔遠人，仍准依棲澳地。現在澳夷計男婦三千五百有奇，內地傭工藝業之民雜居澳門二千餘人，均得樂業安居，誠聖天子覆幬無外之盛治也。”<sup>④</sup>“澳門山水長卷”描繪的似乎正是“懷柔遠人”、“樂業安居”的乾隆“盛治”。

綜合上述，“澳門山水長卷”是目前發現的尺幅最大（最長）的澳門古地圖，也是目前現存的最早最宏大的以澳門為主題的手繪中國傳統山水畫，繪製時間大約在乾隆早期或中期，也就是18世紀中期，可能也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幅中國視野下的以澳門為主題和中心的傳統的清代中國山水長卷。筆者認為，“澳門山水長卷”是澳門歷史和文化的一個重大發現。和目前發現的所有中外繪製的澳門地圖或繪畫相比，此卷氣勢恢宏，特點鮮明，具有不可比擬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值得澳門學界進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撰寫途中獲得金國平、朱天舒、蔡淵迪、郭妹玲諸位師友幫助指導，特此致謝。）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 校對 吳浩彭 黃耀岷 ]

<sup>①</sup>關於長卷繪製的澳門社會風俗，參見楊斌：《百里江山圖——新發現的一幅新加坡藏澳門山水長卷初探》，《文化雜誌》（澳門）2021年總第113期，第6—25頁。

<sup>②</sup>[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後序”，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5頁。

<sup>③</sup>[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45頁。

<sup>④</sup>[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75頁。